

● 现当代文学

大道之行 殊途同归

——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思想、创作与外国文化之关系的比较研究

曾 庆 元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曾庆元(1942-),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基础理论、文艺思潮研究。

[摘 要] 20 世纪初,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代思潮的推动下,外国文化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思想和创作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外国文化滋润了他们的反叛精神,为他们提供了犀利的思想武器,促使他们成了旧时代和旧文化的最有力的批判者。他们还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自己思想的蜕变和飞跃,并从外国文学中吸取“精粹”,化作自己的血肉,创作了风格完全不同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辉煌巨著。

[关键词] 鲁迅;郭沫若;茅盾;外国文化;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720-07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三位无产阶级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实践都曾受到过外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他们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但他们的创作并没有为个人化的情绪所左右。相反,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关注着时代变幻的风云,并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完成了思想的蜕变和飞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战士和伟大旗手。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外国文化对鲁迅、郭沫若、茅盾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巨人起了何种作用;他们三人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方法各有什么特点。相信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建设与发展会有历史镜鉴的作用。

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人的出身背景惊人地相似。他们都生长在中国南方的小城镇,在一个小康之家接受了严格的旧式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他们从小都具有一种反叛精神。郭沫若因反对旧式教育曾三次遭到“斥退”;茅盾也因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被嘉兴府中学除名;鲁迅在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路途中,看到了上流社会的虚伪与堕落,滋生了寻找别样人生的念头。走出家门后,他们的视野大开,广泛地接触新学,很早抱定了改革社会、改良人生的志向。鲁迅于 1903 年在东京加入光复会,茅盾于 1920 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郭沫若也很早就接触了革命活动。

滋润他们的反叛精神,促使他们走向革命人生的,除了时势环境的压迫,革命志士精神的鼓舞外,再就是当时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化。鲁迅、郭沫若当时都是学医的,绕了一个大圈才与文学结缘,只有茅盾因家计窘迫,在商务印书馆做了编辑,算是直奔了文学事业。鲁迅、郭沫若当时都相信科学可以救国,可以

造福于国人。结果,他们都弃医从文,成了大作家。但弃医的原因却不同。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为自己同胞精神的麻木所刺痛,他深深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他后来反思道:

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第5页)

郭沫若患有耳疾,这毛病虽然给学医带来了许多困难,但后来说及弃医从文的原因时,他曾说是想以文艺为武器,“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的诗人气质和对文学的偏好。在东京帝大,郭沫若贪婪地吮吸着来自异邦的营养,读了大量的外国作品。泰戈尔诗的“清新和平”使他“年青了二十年”;惠特曼诗的粗犷雄浑,又使他彻底地为之“所动荡”;他敬爱歌德,希望在中国也掀起“狂飚突进”运动。

鲁迅在现实生活的刺激下走向文学,郭沫若在浪漫激情的摇荡下拥抱缪斯。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和情感气质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文学道路。鲁迅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郭沫若则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匠。

中国近代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质的区别在于是否反封建。鲁迅、郭沫若、茅盾都是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们彻底地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是为人们所称道的。但他们所凭藉的思想武器和战斗方式却迥然不同。

“五四”时期,鲁迅还是一个急进的进化论者,严复译的《天演论》曾给予他极大的影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不仅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鲁迅相信它,认为它是反对保守停滞的思想,抵御外侮,增强民族自信的武器。为了宣传新思想,“五四”前鲁迅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以及《破恶声论》等文章。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介绍了八个“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诗人。这些诗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但共同特点是“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且“争天拒俗”,“力足以振人”。在《文化偏至论》里,鲁迅提出了“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偏至发出了疑问,将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本质作了揭露,指出这不过是“借众以凌寡”,让“千万无赖之尤”取代“独夫”统治罢了。当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在热烈向往西方的政治制度,追慕资本主义文明时,在中国只有孙中山和鲁迅这样少数清醒者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可以说是一种超前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根源之一是封建黑暗势力在中国过于强大,资本主义思想过于无力。正是在这样反思的基础上,鲁迅对封建主义的腐朽和顽固才有了新的认识,反封建的立场也更坚决。这时候,鲁迅对与中国命运相同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总想“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我所注意的是芬兰、菲律宾、越南的事,以及匈牙利的事。”因为这些民族的文学里都有强烈的反封建、御外侮的思想,他们“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于是,他乘战斗的间隙翻译了匈牙利籍的论文《裴彖飞诗论》,俄国安特莱夫的小说《红笑》(残稿)、《谩》《默》,波兰显克微支的小说《灯台守》中的诗,俄国迦尔洵的小说《四月》等文学作品。

“五四”运动的兴起,使鲁迅在思想上摆脱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惶惑,他以前所未有的战斗姿态,向封建主义发起了进攻。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以及此后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孔乙己》《药》等三篇小说、《我之节烈观》等24篇杂文,以及《梦》等六首新诗,尖锐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礼教的实质,号召人们起来掀翻这“吃人”的筵席!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思想影响和社会震动都是空前的。

如果说鲁迅彻底的反封建立场的确立,是因为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华民族沦为列强欺凌的对象而满怀愤懑之情的结果,那么,郭沫若彻底地反封建的立场的确立,更多的原因则是封建制度对诗人活跃的个性、自由的愿望的压制与摧残。少年时代,当他被关在私塾里,读着“就像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忍受着“打掌心”、“打屁股”、“笋子炒肉”等体罚时,他就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找到了他向往的自由精神。林译小说《迦茵小传》曾引起少年郭沫若的“深厚的同情”,赚得他“大量的眼泪”。他曾

动情地说:“当我读到亨利上古塔上去替她取鸦雏,从古塔的顶上坠下,她张着两手去接受着他的时候,就好像我自己是从凌云山上的古塔顶坠下来了的一样。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2](第 113—114 页)司各特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等浪漫主义作品都使他“感受着无上的兴趣”。他甚至认为司各特的作品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他说:“我受司各特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们从郭沫若的历史剧和小说中的确可以见到司各特善于表现宽广壮烈的场面,精于安排大起大落的情节影子。

郭沫若对外国作家、作品的好恶和取舍的标准是是否符合诗人的个性与“自我”。他钦慕雪莱,在译诗的小引里写道:“我爱雪莱,我能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他喜欢屠格涅夫的小说《新时代》,他说:“我因为这书里的老主人翁涅屠夫大诺夫,和我自己有点相像。”世纪初“新罗漫派”(现代主义)流行,特别是德国表现主义文学的兴起,都令郭沫若兴奋过。他后来说:“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破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破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他曾忘情地高呼:“德意志的新兴艺术表现派哟!我对于你们的将来寄以无穷的希望。”^[3](第 99 页)表现个性、张扬自我,也是反封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4](第 239 页)正因为如此,在“五四”爆发前两三年,个性解放甚至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和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

郭沫若用来反封建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泛神论。泛神论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理论,泛神论否认神是造物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泛神论蔑视偶像权威,主张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与郭沫若的思想十分合拍。泛神论主张“物我无间”的境界,把宇宙万物视为有生命的对象,为诗人驰骋艺术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郭沫若认为“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

事实上,郭沫若这一时期的世界观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趋势,除了个性主义、泛神论外,还有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么多互不相干甚至有些彼此对立的思想,居然和谐地集于他一身,真是不可思议。究其因可能这些思想都有反封建的意义,这是它们暂时和平共处的基础。当然,郭沫若此时的世界观的多元化,也可视为世界观的不定型,只要是反封建的新思潮,且又符合他的诗人个性的,他都予以容纳、赞美,甚至宣称为是自己的世界观。1924 年他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仅只了解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粗浅的知识,他便深信自己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了。鲁迅在“五四”前就信进化论,在漫长而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他早已看出进化论的偏颇,进化论的思路也在实际生活中“轰毁”,但直到 1932 年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了,才郑重地宣布彻底地放弃了进化论的思想。相比之下,他们俩的世界观一个确立得何其迅速,一个扬弃得何其迟缓!郭沫若的浪漫与鲁迅的严肃又对比得何等鲜明!

茅盾走上反封建的道路没有绕什么弯子。“五四”时期,他的主要活动是从事理论批评和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他虽未出国留过学,但却刻苦自学外语,并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大的翻译家之一。他早期的译作多是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他较早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0 年便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一段时期内他曾担任党内的具体工作,“和当时的革命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茅盾早期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并于 1921 年发起“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他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东西;不论它是客观的描写事物,或是主观的描写理想,总须以人生为对象”。其后,他摆脱了单纯的为人生或为艺术的概念之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文艺。他在 1925 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全面地介绍了这一新兴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强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阶级本质,指出所谓“艺术超然独立”的论调不过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要为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而努力。这种理论在当时虽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能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武器的人,的确还不多见。在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文艺斗争,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的文艺论争中,他都能基本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支持正确的主张,反驳错误的意见,及时总结论争的经验教训,推动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观察

分析社会,指导文学创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人。他的现实主义巨著《子夜》的发表,表明他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三位文化巨人,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从外国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找到了批判的武器,都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是由进化论转化到阶级论的,郭沫若是由个性主义转化到阶级论的,茅盾可算是由为人生主义过渡到阶级论的。鲁迅经历了长期的战斗,是“从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的思想转化是对旧我的彻底否定。革命的人生观一旦确立,就如坚挺峭拔的高山峻岭,不再有任何的动摇。郭沫若在斗争中不断选择,不停地飞跃,完成了世界观的改造。作为思想家、革命家,郭沫若是一个坚定的集体主义者,作为诗人,他与个性主义又难以割舍。在革命人生观的确立上,他不如鲁迅那样稳固。革命高潮期的过分激昂(如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与革命低落期的过分消沉(如诗集《星空》中逃避现实、逃避斗争的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茅盾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他的现实感不像鲁迅那样是“从痛苦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得到的,便更多的是得益于他的理论修养。与鲁迅相比,他很少解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练掌握,往往掩盖了他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大革命失败后他流露出来的悲观情绪,以及小说《蚀》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都说明其世界观的转变是不彻底的。这与茅盾走向革命的道路比较平坦,较少曲折和考验有很大关系。

毛泽东对鲁迅战斗一生的评价是极高的。他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5](第53页)毛泽东所论历史人物甚多,但持这样毫无保留的态度却是绝无仅有的。

鲁迅深谙中国的国情,他了解中国的历史,也了解它的现在;他了解它的人民的优点,更了解他们的弱点;他“知道革命的实际”,也“深知敌人的情形”;他明白对手的底细,也清楚自己的毛病。虽然他没有读过《资本论》一类的经典,但他立足于事实,而不是立足于浪漫的想象;立足于事实,而不是立足于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这是鲁迅思想永远鲜活长青的原因。当然,鲁迅也学理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论,曾令他感受到思想收获的喜悦。但他决不照搬,他要检验这些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用。他不像郭沫若那样,对新思想一律顶礼膜拜,主动认同;也不像茅盾那样,为了指导全局,去追寻理论的系统 and 完备。他只是拿来,加以消化,只吸收与自己、与实际有益的养分。他对进化论、超人哲学的改造,他对西方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的批判,他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扬弃与吸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都立足于事实之上,这又是鲁迅思想战无不胜的原因。

作了这样的对比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位巨人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的差异:郭沫若有广泛的精神兴趣,“他时常一拍即合,很容易就迷恋上了某个外国作家”。“当郭钟情于这些外国作家的时候,他会进入与作品强烈共鸣的状态,他会‘感觉到了骨肉般的亲热’,他的思想感情会受到猛烈的冲击”。“这不是一般的阅读,这是情深意挚,灵犀相通的精神交往。”^[6](第332-333页)茅盾的文学活动是“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之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不仅介绍“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而且“译西洋名家著作,不限于一国,不限于一派”。对外国文学的认识一直执着于全面而系统。谈到这样做的目的时,茅盾说:“今日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7](第19-21页)鲁迅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8](第128页)郭沫若看重与外国文学交流中自我精神的丰富,茅盾考虑的是外国文学的引进如何对革命事业有利益,鲁迅则着重追求个人思想的锻冶与无私的奉献。这三位文化巨人都是伟大的,都为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鲁迅无疑又是巨人中的巨人。

鲁迅、郭沫若、茅盾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卓越的理论家,而且还是卓有成就的作家。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野草》以及大量的杂文,奠定了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是“五四”时期新诗的代表作,他的历史剧亦享誉中外。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的问世,被认为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重要的收获,是中国无产阶级

级革命文学趋于成熟的标志。他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等也以深刻的内容、娴熟的技巧,为他赢得了声誉。他们的文艺创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鲁迅刚开始走上文坛时,感兴趣的是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摩罗诗力说》不仅是他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介绍,也是他对摩罗诗人在思想上的确认。然而,真正开始创作时,沉稳的个性、踏实的精神,又把鲁迅拉到了现实主义的一边。这其中,俄国和东、北欧等国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8](第 389 页)

鲁迅早期的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以至《阿 Q 正传》所表现的还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反映的还是较为笼统、较为抽象的“国民性”、“救救孩子”之类的问题。直到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一个阶级论者。在这一思想变化过程中,外国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对他的新的世界观的形成,也是起了促进作用的。他曾说过:

……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夜煮东西。^[9](第 354 页)

自此以后,鲁迅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取得了突破,比如《祝福》(还有后期的杂文),对事物本质的把握都前进了一大步。

鲁迅在创作技巧上主要是运用白描、“画眼睛”一类的传统手法,他能用极俭省的笔墨,勾勒出对象的神韵。但鲁迅也从外国文学中学到不少表现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技巧,如象征、荒诞等手法。他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10](第 212 页)茅盾称赞他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如在《孔乙己》里,他运用了果戈理、显克维支的“用幽默的手法写阴惨的事迹”的技巧;《阿 Q 正传》融合着夏目漱石作品的“轻妙的笔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并吸收了安德列耶夫以先觉者与不觉悟群众对照深化主题的手法等等。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便开始接触外国文学,并受到它的熏陶。他“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也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他读过一些俄国烧炭党人的小说,十分仰慕那种殉教精神。以为“他们之间杂于卑贱的厮役之间”,后来竟到自己“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在郭沫若收藏着自己“青春时期的残骸”的作品《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以及中篇小说《落叶》抒情长诗《瓶》里,郭沫若炽热的追求与忧郁的情思,幸福的欢畅与痛苦的隐衷交织成起伏奔涌的情感之潮,荡漾在作品与读者之间,也荡漾在作者和他所热爱的外国作家之间。

对郭沫若诗风影响最大的外国著名诗人是惠特曼和歌德。郭沫若诗作中那火山爆发、岩浆奔突般的激情主要来自惠特曼,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11](第 143 页)郭沫若几乎是怀着崇拜的心情景仰歌德的。他和田汉在日本曾“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让人摄影,意在“以歌德席勒暗自期许”。郭沫若、宗白华、田汉三人合作的《三叶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并希望以此在中国掀起一场狂飚突进运动。郭沫若特别喜爱具有反叛精神、个性极强的外国诗人。所以,雪莱、海涅这样的诗人在他心目中也占有特别的位置。在他前期的诗作《Venus》《别离》《死的诱惑》中都分明地留下了他们的影响。

郭沫若在接受阶级论后,不仅否定了自己的个性主义,也否定了他原先景仰、钦慕的精神偶像。他抛弃了他曾陶醉过的泰戈尔、歌德。他说泰戈尔“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12](第 148 页)当他以新的目光重新审视歌德的时候,那盲目崇拜的狂热已

完全褪尽,他说:“我敢于这样说,像歌德那样的人是值不得我们崇拜的。……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号手,但从他做了隈马公国的宰相之后,他老实退回到封建阵营里去了,他那贵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实在有点薰鼻。”^[13](第69页)对托尔斯泰、拜伦他都作过这样的批判。郭沫若诗歌艺术上的特点是他狂放不羁的个性与思想开放的时代决定的。它辉煌的色彩,战斗的情绪,激越的风格,铿锵的格调都应合着他的个人心理和时代的要求。他的作品里,既有《天狗》《晨安》《匪徒颂》那样气势雄浑的“惠特曼式”的诗,也有《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湘累》等意象恢宏的“哥德式”的诗。周扬说郭沫若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战斗精神”。

茅盾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开始的。他不像鲁迅那样对外来的文化进行严格的筛选,只吸收有益于自己的成分;他也不想郭沫若那样,对外来的文化很少拣择,只管吸收自己喜爱的东西。他译介外来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导新文学,改造旧世界。他在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以使人们“对欧洲文学及其发展有一个初步而又正确性认识,免得他们在茫茫的书海中迷失方向。”对于新的东西,他的态度是:“没有将对象研究透彻,决不肯贸说一个‘是’或‘否’。”这种科学态度和全局观点,同他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的身分是相符的,同他主张文学“指导人生”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对待外国文学的这种态度也使他在创作中不偏执于一家之言,通过比较鉴别博取众长,养成了大家的气度。1927年秋,茅盾开始文学创作,其处女作《幻灭》发表后,有人说它受了屠格涅夫《前夜》的影响,其实,茅盾个人并不喜欢屠格涅夫,对他的作品也读得不多,这种评论使他“当时觉得很惊异”。茅盾的另一短篇《一个女性》发表后,也有人说它有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的影子。茅盾觉得这这也是一个误会。1932年《子夜》出版后,有评论者从《子夜》对社会生活的描写,规模、场面壮观,气势宏大等方面,断言茅盾是“中国的辛克莱。”瞿秋白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子夜》与左拉的《金钱》似更接近^[14](第438页)。然而茅盾却说,写《子夜》之前,他还没有读过《金钱》。他更不承认自己是辛克莱。这例子当然不是说茅盾没有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他本人也承认:“我觉得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15](第26页)但他不刻意去模仿某个大家,也不把自己归宗于外国哪个流派。他认为优秀的作家应是“融化了他所研究的甲乙丙丁等各家,然而他所写的作品非甲非乙非丙非丁……而亦似甲似乙似丙似丁。”^[15](第453页)他自己正是这么去做的,所以人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作品中存在着外国文学的影响,却又无法指认这影响究属何人、何流派。这也说明茅盾在自己的创作中已跳脱了模仿,能在借鉴中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

大道之行,殊途同归。鲁迅、郭沫若、茅盾从各自不同的人生出发成为无产阶级的杰出作家,因素很多,外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主要的因素之一。他们从外国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从外国文化中学到了许多新的表现技巧。但这种影响不是孤立地镶嵌在他们头脑的某个板块上,它溶合在其他因素之中,共同形成了作家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个性,形成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参 考 文 献

- [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6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3] 郭沫若.自然与艺术[A].文艺论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4]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5] 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
- [6] 曾小逸.走向世界的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7]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 [8]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9]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1] 郭沫若. 我的作诗经过 [A]. 沫若文集: 第 11 卷 [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12] 郭沫若. 泰戈尔来华之我见 [A]. 文艺论集 [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13] 郭沫若. 学生时代·创造十年 [A]. 沫若文集: 第 7 卷 [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14] 瞿秋白. 《子夜》与国货年 [A]. 瞿秋白文集: 第 1 卷 [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 [15] 茅盾. 谈我的研究 [A]. 茅盾论创作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 [16] 周扬. 郭沫若和他的《女神》[N]. 解放日报, 1941-06-10.

(责任编辑 何良昊)

Western Culture & LU Xun, GUO Mo-ruo, MAO Dun's Creations Comparative Analysis

ZENG Qing-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ENG Qing-yuan (1942-),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fundamental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thoughts.

Abstract In the time trend of "Seeking truth from the West"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ulture civilized great influence upon both thoughts and production of LU Xun GUO Mo-ruo and MAO Dun by nourishing their rebelism, providing them with trenchant arms of thoughts and making them the most powerful critics against the Old Era and the Old Culture. However, the above three experienced quite different metamorphoses and leaps of thoughts as an evolutionist, LU Xun eventually converted to classism, GUO Mo-ruo ascended from individuality to collectivism, while MAO Dun went forward from concerning livelihood to advocating revolution. At first, GUO Mo-ruo almost prostrated himself before Western Culture, then developing the useful and discarding the useless. MAO Dun starved to pursue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completeness of theory for guidance of the general situation. LU Xun, established himself in Chinese reality, drawing from Western Culture only what was useful to himself and to the reform. Moreover, they assimilated "pith" from Western Culture in their own special way and produced magnum writings of diverse styles and of Chinese manner.

Key words LU Xun; GUO Mo-ruo; MAO Dun; Western culture; comparative analysis